

# 书 品

(2007年第4辑)

徐俊 主编

中华书局

# 记阎宗临与樊守义

——读《选堂序跋集》偶得

## (一)

不久前我读了饶宗颐教授的新书《选堂序跋集》，感到如进入国学大观园中，有口不暇接、美不胜收之叹！但又感到惭愧的是，在林林总总的众多序跋书中，只有两种书是我曾读过的书：一是姜伯勤学兄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是阎宗临教授的《阎宗临史学文集》。前者是当今史学界的知名学者，这里自不待言，而后者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中西交通史学大师，可是现在知道和了解他的人已很少了。我忽然想到阎公此书我也有一本，便急从旧籍中觅出，准备重温教诲。不料从书中却发现了一封给我的信和一份《身见录校注》复印件，这又引起了我一声叹息和尘封多年的回忆。现我将这段往事记下来，再写一点我重读饶公《阎宗临史学文集·序》后的一点心得，也算是我对过去错失出版阎公著作机会的稍赎前愆吧。

大约是1965年上半年间，中华书局还在西郊翠微路的时候，一天忽然有两位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年青同志来找我，说他们系里有位教师写了一些中西交通史的古籍校注稿，问中华是否愿意接受出版。我过去从未听说山西大学有人搞中西交通史研究，以为作者大概是一般的爱好者，便不问他是谁，就回答说：“请他把稿寄来让我们看后再说吧。”此后再过一段时间，我就收到了上面所说的这封信和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谢方先生：近来可好！从北京回来，又去了张家口。由于大家共知之事，迟迟稳不下心来，信复迟了，请不予计较。《身见条校注》一文，见于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山西地方史料研究》，当时正值最困难时期，书的纸质过次，印刷已不清，复印得很不理想。原书实不可能觅到奉赠了。好在慢慢犹可阅读，今奉上请检收。今后这里万一还有需要代为检查者，望不必客气。

信末没有署名和日期，是用山西大学稿纸写的，内容有点神秘。原来这时已是开始对吴晗等“三家村”的揭发批判时候，这就是信中所说的“大家共知之事”。但收到信后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身见录》竟是我前所未知的中国最早一部欧洲游记，而校注者又是我前所未闻的一位中西文化交流史学者，他早在1937年游学欧洲时便在罗马图书馆发见此稿并拍照后带回国内，于1941年首次整理校注在报上公开发表，使史学界大开眼界，而我对此均一无所知。当时我便很想到山大向阎公求教和组稿。但中华书局这时已开始检查书稿政治质量问题，对“涉外”问题要求特别严格。我也未能及时给山西大学历史系复信。不久政治形势越来越紧，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开展，此后就是“文革”的到来，中华业务全部停顿，我想去向阎先生组稿的事便不了了之。

直到1998年秋，在我退休了四年之后，又意外地接到了山西古籍出版社寄来的《阎宗临史学文集》，才惊悉阎公已于1978年辞世。也就在这时，我首次读到了阎公写的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精彩纷呈的文章和饶公为此书写的序言，我才认识到阎公原来是一位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大师，而此前多年我却浑然不觉，令我汗颜。我与山西古籍社此前也素无联系，我估计《文集》很可能是阎公哲嗣守诚兄嘱托出版社寄来的，《文集·后记》的作者就是时在首都师大任教的守诚兄，而早年到中华来找我的山大两位年青教师之一也可能就是守诚兄。此事现在回想起来，仍使我内疚不已。

## (二)

饶公为阎公文集写的序虽然短短 500 余字,但却句句都是实话,而且含义深刻,说到点子上,对整个中外关系史研究,都有指导意义。

饶公在序中首先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的一段话,并指出“治学之道,亦何以异是”。对中外关系史研究而言,所谓“己”,就是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所谓“彼”,就是外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的中西交通史诸大家,如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等,他们主要是熟悉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但外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均未触及,他们只读过或翻译过外国当代汉学家如夏德、伯希和等的著作和文章,都未到外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过第一手资料,因此他们实际上未能“中西兼通”,只能是“一胜一负”。阎公则不然,他除通晓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外,还到西方图书馆、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有关西方 16 至 18 世纪的传教士第一手资料,因此他对 16 至 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能真正做到“兼通东西”,饶公称赞他“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饶公真不愧为阎公的“知音”。

阎公出身于山西五台县农家,早于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便独自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后又到瑞士读大学,在留学期间又到法国、意大利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西方大量有关资料,写成了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文集》中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一篇便是这篇博士论文中第四章的中文释文),为导师所激赏。抗日战争初期阎公回国,后在广西与饶公相识,二人同在迁到桂东山区中的无锡国专任教,成为知交。抗战胜利后,阎公曾一度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后又返回山西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教期间,他主要是讲授汉学史和 16 至 18 世纪的中外关系。他

是我国最早也可能是唯一一位能用西方古典原著和中国古籍相结合讲学和写作的教授、学者，因此饶公称他是“中西兼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言并非过誉。

这里试举两个具体例子：上世纪 20 年代北京辅仁大学教授陈垣先生发表了《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一系列有关中西关系史文章，揭开了清皇室内部残酷斗争的一幕，使学术界眼界大开，但他仅根据中国故宫所发现的档案资料写成，而未能利用西方传教士方面的档案资料和著述，只能算是“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而已。

另一例子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出现了“澳门史”研究热，也发表了不少质量不错的著作和文章。但所论内容，主要都是根据中国文献资料立论，利用葡文原始资料的研究极为少见，大量的葡文档案资料更无人触及（如葡萄牙东波塔档案），也没有翻译。这样研究澳门史，也不过是“一胜一负”，成绩有限。当前内地学者几乎是无人懂葡文的，只希望澳门学者目前多做一点葡文原始资料的翻译整理工作。阎公《文集》中的《清初中西交通若干史实》一文中的第十一、十三、十四节，谈葡使来华及有关澳门史料问题，都是从梵蒂冈图书馆和罗马传信部档案处中的有关文件译出的，亦殊为珍贵，但目前澳门史学者亦少见利用。

### （三）

这里再说一点樊守义回国后的情况。

阎公在《身见录校注·后记》中说，樊于康熙六十年（1721）写成《身见录》后，“并无什么可述的地方，死于乾隆十八年（1753）”。从 1721 年到 1753 年，共长达三十二年的时间中，樊守义在国内竟无声无迹，不见踪影，这令我生疑。是否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阎公一时尚未查到有关资料，长期以来，这是我脑中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到了1995年,我读到了法籍耶稣会学者、徐家汇天主堂神父费赖之编著、冯承钧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三一〇就是《樊守义传》,其中说到他在雍正与乾隆年间曾参与苏努教案事件。苏努一家被放逐到西北长城边口外,《传》中说樊“曾赴西宁慰问苏努全家。守义为华人,不启人疑,是以不难携北京诸神父之巨金往赠被谪之宗室……”最后又说:“苏努全家或歿于谪所,或蒙赐还,以后守义则往来于直隶、辽东一带鼓励教民”云云。费赖之写此传是根据18世纪在巴黎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巴多明神父在北京写的信中的材料编成的。《书简集》共34卷,阎宗临在《文集》中《杜赫德〈中华帝国志〉》一文中曾有详细介绍,说明他曾翻阅过这一文献,但由于它的数量和内容太庞大了,阎公未能发现其中在巴多明神父的信中谈及樊守义的材料,这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信中只说樊的教名(Louis Fan),而不是他的原名。因此阎公也就无从知道樊守义在康乾间长达三十二年的事迹了。关于巴多明神父的这些信,现在也已经有了中文翻译,见于2001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三卷中,读者可以查阅参考,这里就不详述了。

最后,说一点关于饶公本人就是一位“兼通中西”的大学者。记得在1988年,我曾通过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沈建华女士向饶公组稿,准备出版他的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集。蒙饶公俯允,并列出了文集的有关目录。内容从中国到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包括天文、地理、语言、历史、音乐、美术、考古、文学、敦煌学等方方面面。我们商定了以《比较古史学论丛》为总名,分三类:第一类为《近东开辟史诗》之中译本,第二类为《吠陀与中国古史》,第三类为《符号与文明》,洋洋大观,合成一书。但我考虑到此书内容涉及多种西方古代文字,排版困难(当时尚无电脑排字),而中华经济效益又不好,请他在港设法寻找文化基金会予以赞助。他在复信中说:

兄主张合为一书,以免零星,难以搜求,甚是。惟以卷帙

较繁，整理当需时日，我当尽力为之。至于找寻基金会赞助，当设法进行，俟有解决时，再行函告。

当时是1988年8月9日，其时中华尚在王府井大街。到90年代中期，我退休时，中外关系史一时无人接手，饶公组稿的事自然就搁在一边。我至今尚保存饶公过去给我的两封信，现已成为我怀念大师的唯一珍品了。

---

· 书苑撷英 ·

《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钱婉约著，中华书局2007年3月出版，定价20元。

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关系的日本，其对于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明治维新(1868)以来，经历了本质性的转变。明治以前的传统汉学，是取一种模仿、追随的心态，以中国儒佛、文史经典为范本，借助中国文化进行自身文化的繁衍和创造；明治以后的中国学，更多是在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实证方法的指导下，把中国古代文化作为一种文本，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批判。因此，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史上，尤其有必要区分“汉学”与“中国学”。

中国学术界一般把国外关于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或国际汉学。但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外中国研究经历了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等方面确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因此，英文中有“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两个概念，前者大致指古典的中国研究，后者大致指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研究。与此相对应，我们应该分别称之为“汉学”与“中国学”。

钱婉约博士《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一书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思想学术的建立、发展为背景，梳理了日本中国研究在近代化转折过程中的种种历史现象与理论形态，包括中国研究的指导思想、理论方法、主要课题、在学术领域的位置等方面的变化，阐述了这种由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与日本近代中国观、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相互关联。

(马燕)

# 淡泊名利之外，谨守规矩之中

——我的父亲王叔岷

● 王国璿

自我有记忆起，父亲只要在家，似乎总是坐在书桌前，专心著述写作。桌面上堆满古旧的线装书，一本本整齐排开，上下斜迭，以备查阅。父亲写文章从不打草稿，直接在稿纸上撰写，字迹娟秀端正，无须另行誊抄。偶而需修改补充，则靠纸条、剪刀、浆糊，随时剪贴修补。就这样年年岁岁，在教学之余，勤力考校经传子史、六朝诗文，始终著述不辍。从 28 岁撰就《庄子校释》，至 85 岁出版《左传考校》，计专书 20 余种，论文 200 多篇。其中尤以陆续花费十七年岁月始完成的一部《史记斟证》十巨册，最足以展现其校勘训诂之笃实功力，以及锲而不舍之治学精神。

其实父亲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非常深情的诗人。暇时抚读《红楼梦》，会为“黛玉葬花”，情灵摇荡；偶见阳台上蝴蝶折翼，窗外杜鹃陨落，径前枫叶飘零，会伫足惋叹，慨然赋诗。可是却选择了一项最朴实无华，艰难沉闷的学术道路，以必须先下“笨工夫”的“古籍校证”，作为终身志业。父亲的诗心和深情，源自天性，他治学的勤奋不懈，则出于对学术责任的执著。时常听父亲提及，影响他学术生命最深者，就是幼时受先祖父王耀卿先生之谆谆庭训，继而进中研院史语所后，受傅孟真先生之启示与鼓励。

父亲一生为人，淡泊名利之外，谨守规矩之中，重视的只是“情义”二字。教学研究孜孜数十年，无论在台湾，或在星马，最大的安慰，就是学生的爱戴。父亲已出版的六本诗集中，为学生写的诗篇特别多。学生送来一束花、一盒糖、一封信、一片落叶，都珍爱无

比。对父亲而言，师生之间以真情相处，亲如家人，何等愉快！由于母亲过世之后，父亲一直孑然独居，落落寡欢，我又长期旅居海外，一群任教台大中文系的“老”学生，自1981年起，约定每逢周三中午，陪伴父亲一起用餐，“有酒斟酌之”，“言笑无厌时”，前后持续几二十年不曾中断，这就是台大同仁间传为佳话的“三中全会”。直到两年前，父亲“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已无足够精神体力每逢周三来台大授课，这段温馨的师生雅集，才在声声惋惜中划下句点。

父亲退休之后，生活简朴，襟怀恬静，平日幽居南港，以读书赋诗自娱，散步赏花自遣。偶而抚弄七弦素琴，或故旧友生来访，亦聊以慰怀。基于对傅斯年先生的感念，父亲始终认为中研院才是他的“家”，虽然孟真先生已去世五十载，中研院也几经变迁，不复当初。总觉得父亲仁爱敦厚，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和而不同的性情，还有那份自觉的孤独意识，甚至对道德情境的执著与追求，都与陶渊明颇有相似之处。而我对陶渊明的偏爱，对学术研究之兴致，亦深受父亲影响。

几岁开始随父亲读诗，已记不清了。不过在父亲跟前“正式”上课读文章，好像是小学三四年级的一个暑假。第一篇就是《五柳先生传》，接着是《桃花源记》……父亲如何讲解，当然不复记忆。只依稀记得，通常是他先念一句，我跟一句。父亲用他一贯的四川腔，十分温和地，像吟诗一般诵读文章，听起来很舒服；我的眼睛就随着他的手指在书上缓缓移动，盯着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不知不觉跟着他轻微摇晃起来，模仿他陶醉的神情和吟哦的声音。又好像每次都是和邻家小孩玩得最起劲的时候，母亲就用她天生嘹亮的嗓子，从屋里朝窗外喊：“国瓔！王国瓔哪！该回来跟爸爸念书啰！”那时贪玩，心里不免嘀咕，真倒霉，别人家小孩都可以一直在外面玩……但还是一面大声答应，一面跑回家。这时父亲往往已坐在桌前等我，书也翻开了，和蔼地唤我坐在他身旁，我三蹦两跳坐上凳子，悬着腿，半趴在桌上，开始“上课”。或许那时还没开

窍吧，我平时话多，意见也多，咕咕呱呱说个不停，一上课，就静默下来，似乎也不会发问，只顺从地跟着念，傻傻地听，有时又仿佛在想东想西，心不在焉的样子。在旁做家务的母亲，偶而会忍不住凑身过来，插嘴问：“到底懂了没有？”

正式成为父亲课堂上的学生，是进台大中文系之后。虽然父亲曾说：“校勘古书，是枯燥无味的工作，却有一种无味之味。”我还是只选了“庄子”，没选“校讎学”。父亲对我没兴趣修“校讎学”，未继承他走考证勘勘之路，毫不介意，对我毕竟选择学术研究为终身志业，欣慰不已，很自然地成为我研究学问，甚至准备教材时，可以讨论问题，征询意见的对象。我未回国之前，遥居狮城，山水阻隔，利用每周一次通电话时间，除了问候生活起居之外，就是跟父亲聊聊自己的教学情形或研究心得，听听他的意见。如今返台已忽忽六载，得以重新在父亲跟前作女儿，是何等幸福之事；父女又同时在台大中文系任教，更是千载难逢之缘。父女相聚，经常一起享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乐趣。我每写一篇文章，若有“得意”的新观点，恨不得先吐为快，父亲总是在我身边，纵容我挥手放言高论，或是面带微笑，点首称许；或是提出另外的看法，引我深思。不只一次，正谈得兴高采烈之际，父亲忽然停下脚步，微仰着头，若有所思似的，双眼凝视远方，然后语含欣慰地说，简直就像他当年随祖父一起读书论学的欢愉情景一样。

我珍惜这份天伦情缘，内心充满感激。

---

慕庐忆往 王叔岷著

• 中华书局即出 •

王叔岷著作集(共 13 种 19 册)

• 中华书局即出 •

---

## ● 来新夏

最近整理旧什物，在一捆书札中，发现几封与古籍整理有关的信札，是1982年我和赵守俨兄之间的通信。那时正是陈云关注古籍整理，李一氓忙着部署的时候。

第一封信是1981年12月28日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公函，内容如下：

来新夏同志：

最近，李一氓同志要求整理出一个资料：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整理的古籍目录。这个书目收录的范围，一是官修（所谓“敕撰”、“敕辑”），二是有关古籍整理的（包括辑佚）。其他一律不收（如《明史》、《日讲礼记义疏》、《开国方略》及其他方略等等）。您在这方面情况比较熟悉，我们想请您大力协助。如蒙允诺，请在明年一月十五日以前把材料邮来，不胜感激，请先示复为盼。谨致

敬礼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81)中华办字386号

我复了一封婉谢的信，守俨或以为公函未说明原委，使我难以着手，所以又亲自写封信来做补充说明：

新夏学长兄：

去年年底，中华有一公函寄奉，因为措词不明确，使你感到有些为难，至以为歉。此事的来源是：有一次李一氓同志在

谈古籍整理时，他表示要有点气魄，学一学康熙、乾隆。事后他要中华的编辑人员搞一份康雍乾整理编辑古籍的材料。有一位同志据有关书目摘录了一些，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弟才建议向我兄求教。李老的发言，弟曾亲自听到。从他的前言后语来推断，应指那一时期官修的诗文总集、类书、工具书，如《全唐诗》、《全唐文》、《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康熙字典》等等。因为当时他还提到可以新编《全宋诗》、《全清词》以补前人之缺，由此可以窥见他的意图。不属于官修者，亦不必收。因为现在的古籍规划小组也是官方机构，私人著述乃另一问题，不能类比。这份材料仅作为参考之用，最多是在《古籍简报》等内部刊物登载。因此请不必过多顾虑。至于体例，李老亦未明言，不过根据以往对材料的要求，似毋须太繁，只要有书名、主编人、编纂时间，大体分分类就足够了。可收可不收者，不妨收入，稍有些遗漏，也没关系（卷帙浩繁的重要书，最好不漏）。这样的材料，我兄驾轻就熟，有两三日大概就可竣工。

宣扬清代武功的书，虽系官修，却是那时的当代史；《明史》对清初来说，也不算古籍，因此不要。以上皆为弟个人估计，但不致与李老的原意相差太远。总之，一切拜托，如有解释仍不清楚之处，望随时提示。专复即候

撰安

弟赵守俨上

82,1,14

因为我和守俨是辅仁大学上下班的同学，他比我矮一年。同窗情义，只能接受这一任务，用了几天时间思考，并翻了些目录书，草拟了一份材料，用回信的方式寄给他，请他把把关。我的回信内容是这样写的：

守俨学长：

编辑部来函并手书均奉悉，辱蒙

垂询清代康乾时官方整理古籍简况，弟对此所知有限。但当时涉及方面之广，成书篇帙之大，搜罗文献之细以及总括前代之气魄，着眼实际之使用等等，尚有可资借鉴之处。谨就所知，略陈臆说，迫于时日，深惧挂一漏万。所以只作举例说明，至祈亮察为幸。

清代康熙、乾隆之际，上承明季古学复兴绪余，在政府提倡、主持之下，广集人才，纷纂群籍，遂使传统文化多获流传，成一代整理古籍之业。以我所见，其可注意者，约有五点：

其一：康乾时整理古籍所涉及之范围甚广。即以经史子集而言，均有多种，例如：

#### （一）经部

（1）《十三经注疏》四一六卷，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此本经整理，附有考证。

（2）《相台岳氏本古注五经》五卷，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本，此五经指易、诗、书、左传、礼记。虽称翻刻，亦附考证。

（3）《周易折中》二二卷，康熙五十四年依古本经传分编，李光地等纂。乾隆二十年，又由傅恒等纂《周易述义》十卷。

（4）《书经传说汇纂》二四卷，康熙六十年王项龄等撰，书成于雍正八年，有世宗序文。

（5）《诗经传说汇纂》二〇卷，序二卷，康熙六十年王鸿绪等撰，书成于雍正五年，有世宗序文。乾隆二十年又由傅恒等撰《诗义折中》二〇卷。

（6）《春秋传说汇纂》三八卷，康熙三十八年王揆等纂。

（7）《周官义疏》四八卷，乾隆十二年官撰。

（8）《仪礼义疏》四八卷，同上。

（9）《礼记义疏》八二卷，同上。

以上从(3)至(9)又统称《御纂七经》。

(10)《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官撰。

(11)《律吕正义后编》一二〇卷,乾隆十一年官撰。

## (二)史部

(1)《二十四史》,乾隆定为正史,殿本附有考证。

(2)《通鉴辑览》一一六卷,乾隆三十三年傅恒等撰。此书从上古到明末,并附南明唐、桂二王。

(3)《通鉴纲目》五九卷,康熙四十六年圣祖“御批”。

(4)《评鉴闡要》十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刘统勋等录。

(5)《广群芳谱》一〇〇卷,乾隆四十七年官修。此书系增辑明王象晋《群芳谱》。

## (三)子部

(1)《性理精义》十二卷,康熙五十六年李光地等撰。此就明胡广《性理大全》删繁举要。

(2)《朱子全书》六六卷,康熙五十二年李光地等撰。此将《朱熹文集》、《语类》整理删节,分十九类编纂。

(3)《数理精蕴》五三卷,康熙五十二年梅穀成纂。

(4)《历象考成》(原名《钦若全书》)四二卷,康熙十三年胤祿等纂。

(5)《历象考成后编》十卷,乾隆二年官修。

## (四)集部

(1)《历代赋汇》一四〇卷,外集二〇卷,逸句二卷,补遗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纂,分类辑录先秦至明之赋。

(2)《唐宋文醇》五〇卷,乾隆三年官修。

(3)《唐宋诗醇》四七卷,乾隆十五年官修。

(4)《四朝诗》三一二卷,康熙四十八年张豫章等纂。其中宋诗七八卷八八二人、金诗二五卷三二一人、元诗八一卷一一九七人、明诗一二八卷三四〇〇人。

(5)《全金诗》七四卷,康熙五十年官修。

(6)《唐诗》三二卷,附录三卷,康熙五十二年官修。

其二,康乾时官方整理之古籍,篇幅均较大,有多至数万卷者,其次数百、数十卷者,尤为数不少。兹举数例:

(1)《四库全书》七九三〇九卷,乾隆四十七年纪昫等纂,共收书三四六一种,分经、史、子、集四部,从不同途径求书,选用适当刊本,各撰提要,为我国最庞大之丛书。

(2)《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始纂于康熙,完成于雍正。陈梦雷、蒋廷锡纂。此书分六编三二典六一〇九部。各部先汇考,次总论,有图表、列传、艺文、纪事等项目。

(3)《明名臣奏议》三五〇卷,乾隆四十六年官修。此书对原文多有删改,不足取法。

(4)《全唐诗》九〇〇卷,康熙四十六年彭定求等纂。此书共收唐、五代二千二百余人,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并附有唐、五代词,作者小传等。

(5)《续通志》五二七卷,乾隆三十二年刘墉等纂,纪传从唐初至元,略从五代到明末。

(6)《续通典》一四四卷,乾隆三十二年刘墉等纂,从唐肃宗至明末典制。

(7)《续文献通考》二五二卷,乾隆十二年刘墉等纂。改编明王圻《续文献通考》,从宋宁宗起,历辽、金、元至明五朝政治、经济制度。

其三,康乾整理古籍,颇重总括前代文献资料。多汇集前代典籍、文献,选录成编,纂为一书,为后人节翻检之劳。例如:

(1)《古文渊鉴》六四卷,康熙二十四年徐乾学等纂。上起左传,下迄宋代诸古文家文章。

(2)《历代诗余》一二〇卷,康熙四十六年沈辰垣等纂。选自唐至明词一五四〇调,九千余首。附作者里贯并词话。

(3)《历代题画诗类》一二〇卷,康熙四十六年陈邦彦

等纂。

其四，康乾整理古籍亦颇注重实用意义，纂辑大批便于运用古籍资料之工具书。例如：

(1)《四库全书总目》二〇〇卷，乾隆四十七年纪昀等纂，对所收书三四六一种，存目书六七九三种共万余种书，每种写一提要，介绍其大致内容，为了解古籍提供了方便。

(2)《康熙字典》四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张玉书等纂。书凡十二集，亦一九部共收字四七〇三五个，每字均详其音训。

(3)《渊鉴类函》四〇五卷，康熙四十九年张英等纂。此书博采明嘉靖以前文章事迹。供辞藻典故之采择。

(4)《骈字类编》二四〇卷，康熙五十八年张玉书等纂。收二字词语，皆齐句首。共采辞藻一六〇四个，分十三门。

(5)《子史精华》一六〇卷，康熙六十年吴士玉等纂。采子史书中名言隽语。

(6)《佩文韵府》四四三卷，康熙四十三年张玉书等纂。分韵一〇六，齐字尾归韵，所采词语以经史子集为序。

(7)历代纪事年表一〇〇卷，康熙五十一年王之枢等纂。上起帝尧，下迄元末，编年系月，条列大事。

其五，康乾为扩大古籍数量，开展辑佚工作，遂使古籍有某些复原。传统文化丰富其内容，考索资料有所增加。《四库全书》重要书源之一，有所谓“大典本”者，即自《永乐大典》中所辑佚书，计经部六六种，史部四一种，子部一三种，集部一七五种，例如：

(1)《尚书精义》五〇卷，宋黄伦撰。

(2)《周官新义》一六卷，宋王安石撰。

(3)《春秋释例》一五卷，晋杜预撰。

(4)《旧五代史》一五〇卷，宋薛居正撰。

(5)《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宋吴缜撰。

(6)《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二〇卷，宋李焘撰。

(7)《东坡年谱》一卷,宋王宗稷撰。

(8)《崇文总目》十二卷,宋王尧臣撰。

(9)《直斋书录解题》二二卷,宋陈振孙撰。

(10)《涧泉日记》三卷,宋韩虎撰。

(11)《古今姓氏书辨误》四〇卷,宋邓名世撰。

(12)《牧庵文集》三六卷,元姚燧撰。

所陈未必符合要求,送请审正,聊备参考。专复 祇颂

撰祺 顺祝

春厘

弟来新夏上

新正初五

不久,守俨来电话,表示谢意,并请我再整理一下,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发表,于是我又改写了一下,题目是《清代康雍乾三朝官方整理古籍例目》下分四小题:一、古籍的校正和注释(包括汇注),二、古籍的汇编、新编、摘编及续修,三、丛书、类书、工具书的编纂,四、古籍辑佚。后在该刊第92期发表,并收入我的《结网录》中。其原始拟意及拟稿为未发表的原件,录出或可备研究当代整理古籍历史者参考。

---

## 周汝昌著作 已出书目

《猷芹集:红楼梦赏析丛话》	49.80 元
《红楼小讲》	29.00 元
《江宁织造与曹家》(与严中合著)	29.00 元
《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	36.00 元
《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	28.00 元

• 中华书局出版 •